

大战略研究丛书
Studies in Grand Strategy

Myths of Empire Domestic Politics and International Ambition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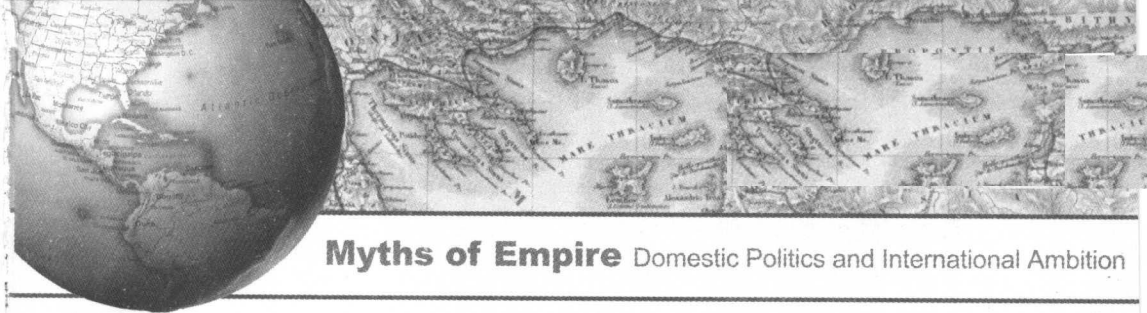
帝国的迷思

国内政治与对外扩张

[美] 杰克·斯奈德 著
于铁军 等译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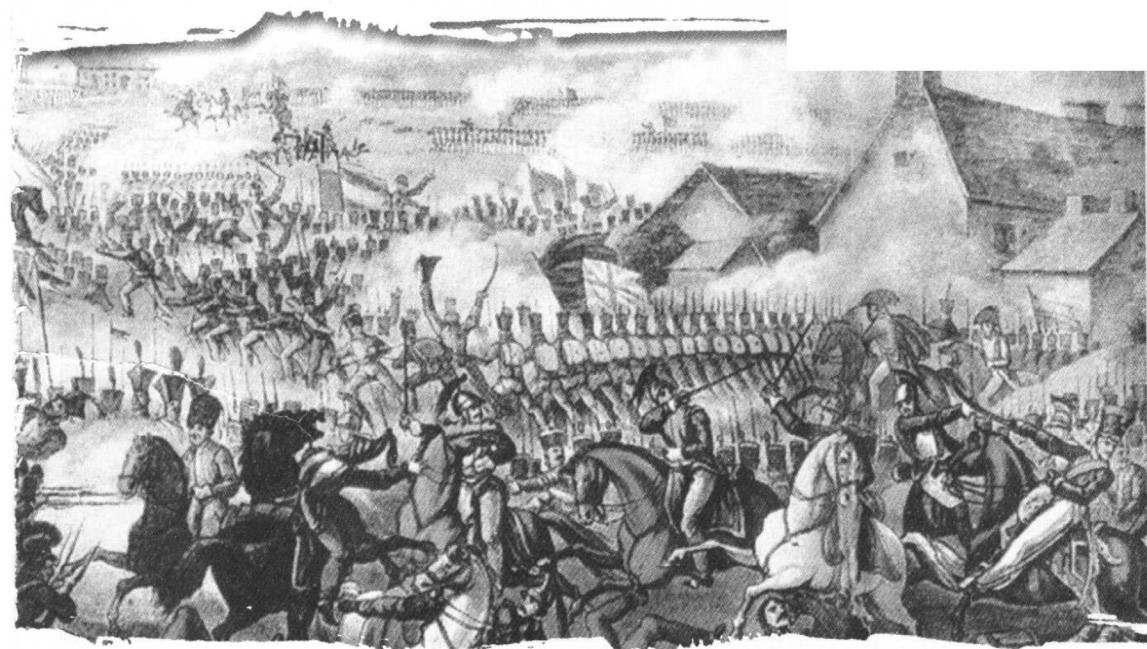


Myths of Empire Domestic Politics and International Ambition

帝国的迷思

国内政治与对外扩张

〔美〕杰克·斯奈德 著
于铁军 等译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著作权合同登记 图字:01-2004-5673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帝国的迷思:国内政治与对外扩张/(美)斯奈德著;于铁军等译.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10
(大战略研究丛书)

ISBN 978-7-301-12789-6

I. 帝… II. ①斯… ②于… III. ①政治-研究-美国 ②美国
对外政策-研究 IV. D771.2 D871.20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7)第149951号

Myths of Empire:

Domestic Politics and International Ambition

by Jack Snyder

Originally Published b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91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Published by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2007

All Rights Reserved

书 名:帝国的迷思——国内政治与对外扩张

著作责任者:[美]杰克·斯奈德 著 于铁军 等译

责任编辑:耿协峰

封面设计:春天书装工作室

标准书号:ISBN 978-7-301-12789-6/D·1874

出版发行:北京大学出版社

地 址:北京市海淀区成府路205号 100871

网 址:<http://www.pup.cn> 电子邮箱:ss@pup.pku.edu.cn

电 话:邮购部 62752015 发行部 62750672 编辑部 62753121

出版部 62754962

印 刷 者:三河市新世纪印务有限公司

经 销 者:新华书店

650毫米×980毫米 16开本 25.75印张 394千字

2007年10月第1版 2007年10月第1次印刷

定 价:46.00元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之部分或全部内容。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举报电话:010-62752024 电子邮箱:fd@pup.pku.edu.cn

总序

跨入 21 世纪,我们迎来一个战略构想的时代。

回首以往,人类历经磨难与碰撞,大战略研究在纷繁复杂的现实中产生、起步、发展;展望未来,人类进步面临着巨大不确定性和机遇,理想与现实交织构成一幅饱含想像与塑造空间的宏大画卷,未雨绸缪事关各国尤其是主要大国的未来,大战略研究即将迎来黄金时代。

—

大战略是对历史的总结、当前的把握、未来的选择。对大国或潜在大国的未来而言,战略谋划至为关键,而大战略研究可为国家战略谋划奠定理论基础、历史纵深、世界眼光、全球视野,对其战略目标的确定、战略路径的选择、战略步骤的安排至关重要。作为国家实力与世界地位之间的桥梁,大战略研究与大国的前景休戚相关。极言之,它事关一个大国的贫富、兴衰、存亡。

对战略重要性的推崇,历代战略家从来不惜笔墨,真知灼见更是俯拾皆是,如“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夫权谋方略,兵家之大经,邦国系以存亡,政令因之而强弱”。安德烈·博富尔(Audre Beaufre)的总结恰当其实:“当历史之风吹起时,虽能压倒人类的意志,但预知风暴的来临,设法加以驾驭,并使其终能服务于人类,则还在人力范围内。战略研究的意义即在于此。”大战略研究发端于 20 世纪早期,随着世界形势的变化,尤其是全球化的日趋加深和各国战略手段的多样化,其重要性逐渐凸现出来。但正如利德尔·哈特(B. Liddell Hart)所言,“大战略研究的极大部分领域尚属于有待探勘和了解的未知地带”。冷战结束以来,世界进入大战略谋划的新时代,促进大战略研究的现实条件已经具备。

大战略研究不仅需要现实的磨砺,更需要学者的推动。大战略

研究强调战略学者的重要性,将他们的深谋远虑视为国家保持长治久安的基础条件,如欧阳修指出的,“盛衰之理虽曰天命,岂非人事哉”(《伶官传序》)。孟子曰:“汤以七十里,文王以百里”(《孟子·公孙丑上》)。即使没有雄厚的物质基础,伟大的战略家依旧可以建功立业。鉴于大战略研究的全局性、宏观性、前瞻性等特征,战略学者必须具有专业性的战略素养。简言之,大战略学者应是饱学的史学家、远见的哲学家、深刻的思想家、敏锐的战略家,具有丰富的学识、弹性的心灵、高度的智慧、进取的精神。

大战略研究强调把握时代的脉搏,体现时代的特征,满足时代的需求。恩格斯指出:“每一个时代的理论思维,从而我们时代的理论思维,都是一种历史的产物,它在不同的时代具有完全不同的形式,同时具有完全不同的内容。”^①只有把握住时代的脉搏,预知、掌握并引导时代的潮流,大战略研究才能更好地以国家战略利益为依归。

二

21世纪初,世界迎来了中国崛起的曙光。这场历史性巨变肇始于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加速于1978年启动的改革开放,其高潮却刚刚来临。我们尚未把握这场巨变的最终结果,但是全世界却从中感知到了中国崛起带来的震撼。

对中国而言,20世纪是一个真正的大时代,一个处于“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的转折年代。20世纪前半叶,中国尚处于不稳定的国际体系的底层,所求者首先是恢复19世纪失去的独立与主权;20世纪下半叶,中国迎来历史性的崛起,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成为现实的期望;尤其是20世纪的最后20年,中国主动开启了融入国际体系的进程,并逐步成为国际体系中一个负责任的、建设性的、可预期的塑造者。概言之,20世纪,中国由弱国向强国发展,从封闭走向开放;世纪之交,世界政治经济体系面临空前广泛而深刻的变革,中国改革开放步入关键阶段;进入21世纪,综合国力竞争日趋激烈,世界的力量组合和利益分配正在发生深刻变化,中国的未来走向更是举世瞩目,中国崛起成为全世界关注和研究的全球性议程。中国崛起与世界转型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84页。

似乎相约而行,这种历史性重合既给人类发展带来了空前的机遇,也给世界带来了巨大的挑战。

中国崛起为我们的大战略研究提供了时代机遇和理论诉求。中国崛起在全球化和复合相互依赖加深的背景之下,而它们极大地扩展了中国的战略议程。对于面临重大契机的中国而言,如何确立适宜的大战略至为关键。只有确立了大战略,中国才能据此开发、动员和运用国家政治、经济、军事、外交和精神资源实现国家的根本战略目标,而不至于拘泥于一时一事的得失。在思考这一问题时,我们遗憾地发现,大战略思维储备不足、目标不甚清晰、框架不够宏观、途径不具操作性、手段不够多元化、心态不甚客观等构成了当前中国战略研究的种种缺憾。值得注意的是,当前的相关大战略研究往往以西方历史经验比附中国的战略思想与战略选择,忽视中国五千年的战略思想积淀,这无疑构成制约中国大战略研究取得突破的重要障碍。

从全球层次着眼,这是一个诸大国进行战略谋划的时代;对中国而言,这是一个呼唤大战略的时代,更是一个构建大战略的时代。战略学者生逢其时、躬逢其盛,中国崛起为其指点江山、激扬文字提供了历史机遇。

三

有鉴于此,北京大学出版社决定与中科院—清华大学国情研究中心合作,编辑、出版《大战略研究丛书》。两家机构的决定可谓慧眼独具,既体现出以国家需求为使命的现实高度,亦展现出致力于学术追求的理想气魄。

本套丛书以中国崛起为经,以大战略理论探索为纬,以史为镜、评估当今、展望未来,致力于推动中国大战略研究的民族化、国际化和专业化,力图在一个不太长的时期,从研究范围、研究内容、研究方法、技术路线等方面逐步确立中国大战略研究的基础,搭建大战略研究的中国平台,并推进中国大战略研究基地的创建。

本套丛书由两部分组成:西方学者的经典旧作和最新力作、中国学者的最新研究成果。大战略基础理论和方法论、大战略国际比较、中国大战略等构成本套丛书的重点。简言之,我们不仅要推窗鉴月,还寄希望于推陈出新。具体地说,引进是促进中国大战略研究不可

或缺的环节和纽带。相比而言,西方学者的大战略研究起步较早,基础雄厚,精品璀璨。一些经典著述所蕴藏的思想财富、战略意义和学术价值,为学界同仁所允可,乃获推崇。翻译引进这些著作将是促进中国大战略研究的积极因素。在中国丰富的传统战略思想基础之上推陈出新更将体现我们的学术追求。中华文明有着几千年生存发展的战略智慧,其现代化将使人类文明进入一个崭新的时代。中国学者应该从中国传统文化中找寻战略研究之道,融合东西方文化之长,从而撰写出既体现中国传统战略思想底蕴又包含西方文化精髓、既立足于当前现实又着眼于未来谋划的战略著作。基于这种考虑,我们将延请国内一流的战略学者撰写学术精品,以飨海内外学者与读者。

本套丛书组织得到中科院—清华大学国情研究中心主任胡鞍钢教授、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院长王缉思教授、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外办副主任裘援平博士、美国普林斯顿大学约翰·伊肯伯里(G. John Ikenberry)教授的鼎力支持。他们的学术指导是本套丛书在理论建构和现实价值等方面质量的保证。美国波士顿学院陆伯彬(Robert S. Ross)教授积极引荐西方大战略著作,居功厥伟。

本套丛书的组织体现了国内学术新锐联袂推进中国战略研究的努力。来自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复旦大学、南开大学、中国社科院、中共中央党校等学术机构的青年学者为了共同的学术目标走到了一起,为中国大战略研究各尽心力。

期盼中国各界支持我们的学术追求,让我们一同畅想大战略研究的未来。

是为序。

《大战略研究丛书》编辑委员会

2004年12月14日

译序

大国过度扩张的国内政治机理

——杰克·斯奈德及其《帝国的迷思》

在美国国际关系学界,大概很少人不知道杰克·斯奈德(Jack Snyder, 1951—)这个名字和《帝国的迷思:国内政治与对外扩张》这本书。^① 斯奈德教授现任教于美国政治学研究之重镇——哥伦比亚大学政治系,是一位著作等身,在国际关系理论、国际安全与战略研究、苏联(俄罗斯)研究、民主化及民族主义研究等诸多分支领域都有很深造诣的学者,而《帝国的迷思》则是其代表作,自1991年出版以来一直备受学界推崇,被认为是一部融理论、历史、现实政策与方法于一体的典范之作。目前,国内学术界除了在介绍现实主义理论在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最新发展时对其人其书略有提及外,较为系统的介绍还不多见。在《帝国的迷思》中译本付梓之际,译者深感有必要对斯奈德其人其书作一番专门的评介,以供读者参考。

本文首先简要介绍斯奈德的学术背景,其次介绍《帝国的迷思》一书的主要内容,然后从理论、研究路径和政策含义等几个方面入手对该书进行简要评价,最后主要从研究路径方面讨论本书所带给我们的启示。

斯奈德于1973年在哈佛大学政府系获得学士学位,1981年在哥

^① Jack Snyder, *Myths of Empire: Domestic Politics and International Ambition*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91). 本书的副标题如果按照直译,应为“国内政治与国际野心”,似不甚通顺。“国内政治与对外扩张”的译法征得了斯奈德教授的同意。他在给笔者的信中说,原著的副标题本来就是“国内政治与对外扩张”,现在的副标题是该书出版时编辑所作的修改,中文本的副标题恢复原样他没有任何意见。

伦比亚大学获得政治学博士学位,此后长期执教于哥伦比亚大学政治系和该校战争与和平研究所,现为该校贝尔福国际关系讲座教授(Robert and Renée Belfer Professor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美国艺术与科学院院士,《美国政治学评论》、《国际安全》和《安全研究》杂志编委。斯奈德还曾长期(1990—2001年)担任享有盛誉的普林斯顿大学“国际史与国际政治丛书”的编委之一,现在仍兼任著名的W. W. Norton出版社“世界政治丛书”的主编。主要专著除了《帝国的迷思》之外,还有《进攻意识形态:军事决策与1914年的灾难》、《从投票到暴力:民主化与民族主义冲突》、《选举战争:为什么新兴民主国家会走向战争》(合著)等。^②与其他学者合作主编的著作有:《多米诺骨牌原理与强者追随》、《国际体系复杂性之应对》、《内战、不安全感与干预》等。^③另外,斯奈德还在《美国政治学评论》、《外交》、《对外政策》、《国际组织》、《国际安全》、《世界政治》和《国家利益》等学术和政论杂志上发表了大量论文。1991年,国际研究协会(International Studies Association)向斯奈德颁发了卡尔·多伊奇奖(Karl W. Deutsch Award),以表彰他对和平研究所做出的贡献。

在美国国际关系学界,斯奈德向以博学多思、才华横溢、作品富于开拓性和启发性而著称,其研究兴趣横跨国际关系理论、国际安全与战略研究、俄罗斯(苏联)对外关系、民主化与民族主义等诸多领域,并且在每个领域中都取得了为学界所公认的成就。斯奈德在国际关系理论方面的贡献,我们将在下文中结合对《帝国的迷思》一书的评介作具体论述,此处简要介绍其国际安全与战略研究、民主化与民族主义和战争之间的关系等方面所做出的学术贡献。

国际安全和战略研究作为国际关系研究的一个重要分支领域,发端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特别是冷战时期的美国。第二次世界大战的

^② Jack Snyder, *The Ideology of the Offensive: Military Decision Making and the Disasters of 1914* (Ithaca, N. 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84); Jack Snyder, *From Voting to Violence: Democratization and Nationalist Conflict* (New York: W. W. Norton, 2000); Edward Mansfield and Jack Snyder, *Electing to Fight: Why Emerging Democracies Go to War* (Cambridge, M. A.: The MIT Press, 2005).

^③ Robert Jervis and Jack Snyder, eds., *Dominos and Bandwagons* (New York: Oxford, 1991); Jack Snyder and Robert Jervis, eds., *Coping with Complexity in the International System* (Boulder: Westview Press, 1993); Barbara Walter and Jack Snyder, eds., *Civil Wars, Insecurity, and Intervention* (New York, NY: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9).

惨烈、核武器的产生以及战后美苏两国乃至东西方两大阵营之间的激烈角逐,使得国际安全和战略研究成为战后美国政策界、学术界和新闻界关注的焦点。鉴于苏联在美国对外政策中所占据的首要地位,苏联(俄罗斯)研究,包括对苏联军事力量和军事战略、国内政治经济情况、苏联对外政策走向以及美苏关系的分析,成为战后美国国际安全与战略研究的核心,其从政府和各大基金会所获得的资金支持最多,同时也汇集了一批出类拔萃的研究人才。

1973年,斯奈德从哈佛大学政府系本科毕业之后,先是在美国国会担任了几年议员助手和国会研究工作,随后便加入到国际安全与战略研究的行列当中。1976—1978年,他曾短期任职于美国著名智库——兰德公司的社会科学部,主要研究苏联军事问题。在兰德工作期间,斯奈德陆续发表了三篇研究报告:《危机时刻的理性——认知过程在威慑失败中所扮演的角色》(1976年)、《苏联的战略文化——对有限核作战的含义》(1977年)和《逐步升级的心理学——1958至1963年的中苏关系》(1978年)^④,讨论苏联的对外战略问题。

在《苏联的战略文化》这篇报告中,当时尚不及而立之年的斯奈德首次提出了“战略文化”这一重要概念,并将之界定为“国家战略决策者通过传授或模仿而获取并彼此分享的关于核战略的观念、情感上的条件反射和习惯性行为模式的总和”,特别是“指导和限制有关战略问题的思考、影响战略问题的规划方式,以及设定战略辩论的语汇和认知范围的各种看法和信念的综合体”。^⑤ 报告认为,苏联具有一种独特的战略文化,这种战略文化“限定了苏联的战略思想和战略行为”。报告还分析了使苏联战略思想具有某种独特性的历史、制度和政治方面的因素,指出当时在美国战略思想界居于重要地位的有限核战争学说及威慑理论与苏联根深蒂固的信念之间是有矛盾的,因此苏联领导人在选择本国的打击目标和武器方面可能不会按照美国决策者的思维模式来行事。这样,通过将文化因素引入到战略研究中,并考察苏联文化是如何影响苏联的战略思维和战略决策的,斯

^④ Jack Snyder, *Rationality at the Brink: The Role of Cognitive Processes in Failures of Deterrence*, Santa Monica: RAND, 1976; Jack Snyder, *The Soviet Strategic Culture: Implications for Limited Nuclear Operations*, Santa Monica: RAND, 1977; Jack Snyder, *The Psychology of Escalation: Sino-Soviet Relations, 1958—1963*, Santa Monica: RAND, 1978.

^⑤ Snyder, *The Soviet Strategic Culture*, pp. 8—9.

奈德对当时美国战略研究界以博弈论为代表的理性研究模式提出了挑战。^⑥虽然斯奈德在这里所使用的“战略文化”概念与后来这一概念的内涵和外延有较大差异,而且其概念界定本身也不无模糊之处,但“战略文化”这一研究思路却为其他学者所继承和发展,成为战略研究领域中的一个十分重要的议题。20世纪90年代中期,哈佛大学教授江忆恩在对这一分支领域的研究成果进行考察时,将斯奈德作为第一代战略文化研究的代表人物之一进行了专门的讨论。^⑦

1984年,以其在哥伦比亚大学完成的博士论文为基础,斯奈德出版了他个人的第一部专著——《进攻意识形态:军事决策与1914年的灾难》。在该书中,斯奈德对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法国、德国和俄罗斯三国的战争计划和战略思维进行了系统的比较和考察,从战略上的理性计算、军事组织本身所具有的动机偏见(motivated bias)以及认知和组织方面的简化偏见(simplification bias)三个变量的相互作用出发,分析了为什么三国的决策者明知道防御比进攻有利,但却依然我行我素地制定并执行进攻性的军事战略,而与此同时,三国决策者的表现为什么又有所不同。为撰写此书,作者曾查阅了大量法国政府的档案材料,并深入当时的苏联进行实地考察和搜集相关材料。该书将理论验证、历史考察与政策分析三者紧密地结合在一起,显示了斯奈德后来一直坚持的学术研究路径。作为康奈尔大学出版社出版的著名的“安全事务研究丛书”之一部,该书出版后受到学界的高度评价。《美国政治与社会科学院年报》称赞该书是“比较自普法战争以来至1914年为止各国总参谋部的战争计划和战略思考的最佳著作之一……无论就其历史视野还是就其对于军事决策的理论含义而言,都是一部雄心勃勃和饶有趣味的书。”《军事评论》也赞扬该书“对

^⑥ Snyder, *The Soviet Strategic Culture*, pp. 38—40. 需要指出的是,斯奈德在该报告中所说的“苏联战略文化”,其含义并非一般意义上的笼统的俄罗斯文化,而是“苏联军事战略家思考战争和作战争计划时所处其中的特定官僚机构和战略情势的产物”(斯奈德教授2007年8月1日给译者的信)。在同一报告中,斯奈德指出,即使是根深蒂固的信念也可能随着技术和其他环境因素的变化而变化,尽管这种变化是缓慢的;而且,战略学说上的偏好也不是影响苏联危机决策的唯一因素,环境方面的诱因及限制可以对战略的变化产生独立的影响。他反对战略研究中的“文化决定论”,并对“战略文化”这一概念的滥用表示关注。这方面的论述,参见 Jack Snyder, “The Concept of Strategic Culture: Caveat Emptor,” in Carl G. Jacobsen, ed., *Strategic Power: USA/USSR* (London: Macmillan, 1990), pp. 3—9.

^⑦ Alastair Iain Johnston, *Cultural Realism: Strategic Culture and Grand Strategy in Chinese History* (Princeton, N. 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5), pp. 5—7.

战略思想做出了重大贡献”。^⑧ 在美国学术界于上世纪 80 年代后期所进行的一项有关国际安全领域研究状况的考察中,该书被认为是过去十年中美国国际安全研究领域中具有代表性的学术成果之一。^⑨

随着冷战的结束,民族主义、种族冲突、民主化和内战等问题成为国际政治中新的焦点。对于冷战结束给国际政治带来的复杂性,斯奈德比大多数学者都更有预见性,也比较早地开始了这方面的研究。1990 年春,东欧剧变尚在进行之时,斯奈德在《国际安全》杂志上发表了《规避新欧洲的无政府状态》一文。该文探讨了中东欧政局的变化对欧洲稳定所可能产生的影响,认为自由主义的“历史终结论”对欧洲未来的看法过于乐观,因为中东欧新兴民主国家由于在民众的政治参与和现有政治制度之间存在很大差距,所以很可能为那些靠鼓吹民族主义起家的军政权的上台创造条件,从而危及国际和平。另一方面,斯奈德认为霍布斯式的现实主义理论关于冷战后的欧洲将会陷入混乱的看法过于悲观,因为通过将新兴的中东欧民主国家纳入到欧洲共同体中,西方可以对中东欧国家国内民主制度的健康发展施加积极的影响。^⑩

在随后发表的一系列文章中,斯奈德继续表达了他对政治民主化过程中民族主义之负面影响这一问题的关注,并对其中的机理进行了深入探讨。^⑪ 2000 年,斯奈德出版了他的第三部专著——《从投票到暴力——民主化与民族主义冲突》,对其在民主化和民族主义关系问题上的观点进行了总结。在这部著作中,斯奈德考察了历史上的德国、英国、法国和塞尔维亚的情况,冷战后的南斯拉夫、高加索地

⑧ 转引自 *The Ideology of the Offensive* 一书的封底内容。

⑨ Joseph S. Nye, Jr. and Sean M. Lynn-Jones, "International Security Studies: A Report of a Conference on the State of the Field,"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12, No. 4 (Spring 1998), pp. 18—19.

⑩ Jack Snyder, "Averting Anarchy in the New Europe,"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14, No. 4 (Spring 1990), pp. 5—41. 该文的修订版,参见 Sean M. Lynn-Jones and Steven E. Miller, eds., *The Cold War and After: Prospects for Peace*, expanded edition (Cambridge, M. A.: The MIT Press, 1993), pp. 104—140.

⑪ 参见杰克·斯奈德:《新的民族主义:现实主义的阐释及其超越》,载理查德·罗斯克兰斯、阿瑟·斯坦主编:《大战略的国内基础》(刘东国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5 年版,第 170—190 页;Jack Snyder, "Nationalism and the Crisis of the Post-Soviet State," *Survival*, Vol. 35, No. 1 (Spring 1993), pp. 5—26; Jack Snyder and Karen Ballentine, "Nationalism and the Marketplace of Ideas,"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21, No. 2 (Fall 1996), pp. 41—75.

区和俄罗斯的情况,以及斯里兰卡、马来西亚、印度、卢旺达和布隆迪等发展中国家的情况,条理清晰且十分有力地论证了当一个国家不具备向民主制成功过渡的条件时,民主化将会激发民族主义狂热,并引发民族冲突。冷战后国际政治的现实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印证了斯奈德的学术远见。

上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斯奈德的学术兴趣开始聚焦到民主化与战争的关系方面,与另一位美国学者、宾夕法尼亚大学政治系教授爱德华·曼斯菲尔德(Edward Mansfield)合作推出了一系列引人注目的研究成果。1995年,两人在《外交》杂志上发表了《民主化与战争》一文。针对“民主和平论”在冷战后美国国际关系学界几乎被奉为社会科学之公理的研究现状,文章另辟蹊径,指出了“民主和平论”当中未加关注的重要一点:即使民主国家之间不打仗或极少打仗这一“民主和平论”的核心论点成立,和平的前景也没有民主和平论者所设想的那么乐观,因为那些所谓的不民主的国家在民主化过程中,常常容易诉诸暴力和战争。^⑫

在这篇文章的基础上,2005年,斯奈德和曼斯菲尔德教授又合作完成了《选举战斗》一书。该书通过严密的数理分析和清晰的案例研究,论证了这样的观点,即,那些政治制度基础薄弱的新兴民主国家特别容易走向战争,因为这些国家的领导人往往试图通过诉诸外在威胁和好战的民族主义论调等方式来博取广大国内民众的支持。斯奈德和曼斯菲尔德认为,由于国家在民主制度得到巩固之前卷入战争的风险非常之大,因此推进民主的最佳方式是从民主所要求的制度建设——比如说法治——入手,在此基础上再进一步推动大众政治参与和推行选举。^⑬ 该书出版后,学界好评如潮,并获得了包括“莱普戈尔德奖”(Lepgold Prize)在内的2005年度美国国际关系和政治学著作的数个有影响的奖项。亨廷顿对该书给予高度评价,称:“美国的对外政策是建立在民主将会促进和平这一前提之上的。而《选举战斗》一书所得出的结论却是:民主化如果处置不当的话,将会

^⑫ Edward D. Mansfield and Jack Snyder, "Democratization and War," *Foreign Affairs*, Vol. 74, No. 3 (May/June 1995) 这篇文章更完整的一个版本发表于同年的《国际安全》杂志,参见 Edward D. Mansfield and Jack Snyder, "Democratization and the Danger of War,"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20, No. 1 (Summer 1995), pp. 5—38。

^⑬ 参见 Mansfield and Snyder, *Electing to Fight*。

导致战争。这对学者和政治家们通常所持有的信念构成了挑战,并使该书成为近几十年来国际事务领域最重要的著作之一。”^④当前,美国在伊拉克战后重建以及在中东伊斯兰世界推广民主过程中所面临的重重困境,从另一方面印证了该著作的政策价值。

从斯奈德的学术背景来看,他既是一位理论家,对比较政治理论和国际关系理论都有深入的研究,同时他又是一位出色的地区问题专家,通晓俄语、法语和德语等多种语言,对各国的战略决策史有系统的了解,而且他还对国际政治现实和重大的外交政策问题保持着高度的关注。正因为作者在上述各个方面都有充足的知识储备,才使得他在对某一国际问题进行综合分析时显得游刃有余,也使得他的著作能够很好地融理论、历史与政策研究于一身。而《帝国的迷思》一书则可以说是最能体现斯奈德研究路径和学术功力的一部著作。

二

《帝国的迷思》是斯奈德撰写的第二部专著,初版于1991年,后来又多次重版。该书出版之后即在学界引起很大反响,各主要相关学术杂志如《国际安全》、《国际组织》、《美国政治学评论》、《美国历史评论》(*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美国历史杂志》(*The Journal of American History*)、《英国历史评论》(*The English Historical Review*)、《国际事务》等纷纷刊登书评予以介绍。虽然该书没有像耶鲁大学历史学家保罗·肯尼迪教授于1987年出版的《大国的兴衰》那样成为一本大众畅销书,但在学术界却获得很高评价,其影响至今不衰。

《帝国的迷思》一书共计八章。第一章为导论部分,提出本书研究的问题,并对其主要论点加以概述。第二章讨论了关于大国过度扩张的三种理论,即现实主义理论、认知理论和国内政治理论,在推敲和对比的基础上,提出并详细阐述了作者自己的国内联盟互助和帝国迷思理论。其后五章为案例研究部分,依次考察了德国、日本、英国、苏联和美国等五个大国进入工业化时代以来的过度扩张情况,并按照第二章中所设定的理论框架,深入系统地分析了每个国家过

^④ 参见 Mansfield and Snyder, *Electing to Fight*, 封底介绍。

度扩张政策的根源及内在机理,对国内联盟互助和帝国迷思理论进行了验证。最后一章对全书内容进行总结,并提出了本研究的理论及政策含义。现按照该书的结构安排,分问题意识、理论假设、案例验证、理论与政策含义四个方面对本书的主要内容予以介绍。

(一) 问题意识

在本书中,斯奈德试图解释,为什么进入工业化时代之后过度扩张(overexpansion)在大国当中如此普遍,德国、日本、英国、苏联和美国都曾在历史上的某个时期出现过过度扩张的情况。与此密切相关的一个更进一步的问题是,为什么某些国家如德国和日本与其他大国相比,特别容易走向极端的过度扩张,而有些国家如英国、美国和苏联则在出现过度扩张的情况时能够比较及时地改弦更张,收缩自身的力量。在这里,“过度扩张”被定义为一国的对外政策导致其他国家结成一个具有压倒性优势的联盟来对之加以制衡,或者该国的扩张成本超过了通过扩张而获得的收益。^⑤

按照斯奈德的总结,历史学家和政治学家关于过度扩张的解释可以归纳为三种基本类型:(1)现实主义的解释。这种解释强调国家在国际体系中的位置对国家对外政策的决定性作用,认为处于无政府状态下的国际环境迫使国家采用军事手段来保证本国的安全,在此情况下,扩张的代价与风险可能是无法避免的。(2)认知方面的解释。这种解释强调由于人的认知过程本身所存在的一些问题,如信念体系的稳定性和认知偏见等,再加上国际政治充满了各种各样的不确定性,国家决策者在战略评估和实施过程中肯定会犯各种各样的错误,包括过度扩张的错误。(3)国内政治方面的解释。这种解释所强调的是利益集团、统治阶级以及它们所提出的战略意识形态,认为只顾自身利益的帝国主义集团“劫持了国家”,打着维护国家安全利益的旗号,把国家政策扭曲为对其狭隘利益的追求,从而导致了大国的过度扩张。

在斯奈德看来,上述三种解释虽各有道理,但也都存在各自的问题。现实主义对大国过度扩张的解释所存在的问题是:从逻辑方面来说,现实主义者一般认为,国家通常会结成制衡性的同盟来抵御侵

^⑤ 本书第7页。下文中引自该书的内容除直接引用外不再另行注明。

略者。因此,至少从长远来看,自国际无政府状态中产生的均势应该是惩罚而不是奖励侵略。这样一来,通过扩张而获取安全的战略便违背了现实主义者自己所表述的国际政治的基本原理。从经验事实方面来说,现实主义对过度扩张的解释往往不加批判地接受帝国的政策制定者对通过扩张而获取安全的战略所给出的那些貌似合理的理由,却没有根据采取这些战略预计会带来什么样的损失以及是否可以找到更为有效的替代战略而对其做出评估。

认知方面的解释所存在的问题是:这种解释无法说明,为什么在工业化时代,大国过度扩张的错误与扩张不足的错误相比要普遍得多,以及为什么某些国家即使是在有清晰证据显示已经出现过度扩张的情况下,也仍然不收缩自身的力量,而是一误再误,最终陷于不可收拾的境地。

国内政治方面的解释所存在的问题在于,如何令人满意地解释狭隘的利益集团是怎样成功地劫持了国家政策的。在斯奈德看来,那些自身利益非常狭隘的集团通常缺乏操纵国家来实现自身之目的的权力或权威,因为其他那些因推行代价高昂的帝国主义政策而使自身利益遭到损害的集团——尤其是国家本身——将会反对这样的政策。利益集团想要控制国家的政策与观念,并不那么容易。而如果选择过度扩张政策的不是狭隘的利益集团而是整个统治阶级,则其在推行政策的权力方面虽无任何问题,但却需要说明为什么他们会具有过度扩张的动机,并且在扩张成本上升时为什么不选择抽身而退。因为对于统治精英而言,推行一种得不偿失的战略最终损害的还是他们自身的利益。

针对现实和理论中存在的这些问题,斯奈德在总结和吸收学界既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提出了他的联盟互助与帝国迷思理论,详细论述了大国过度扩张的国内政治机理。

(二) 理论假设

斯奈德认为,大国的过度扩张最直接地是由国家的安全只有通过扩张才可以获得这一观念所引起的。这种一般性的假设反映在一些更为具体的支持对外扩张的战略观念——斯奈德称之为“帝国的迷思”——当中,包括:国家的收益与损失是具有累积性的(多米诺骨牌理论和“黄金之国”论),进攻比防御有利,以及施加威胁可以使其

他国家屈从(对手是纸老虎、国家一般来说是追随而不是制衡强国)等。

那么这些战略迷思又起源于何处,它们又是如何影响国家的对外政策并最终使各大国走上过度扩张之路的呢?在斯奈德看来,这些迷思是大国内部一些在帝国扩张、扩大军备和建立自给自足的经济圈方面拥有狭隘自身利益的强力集团——如军方、官僚机构、经济部门等——为了为自己的扩张政策辩护而制造出来的。“帝国的迷思”可以使这些利益集团以维护国家安全这一集体利益的名义来掩盖或兜售其狭隘的利己主义政策。而且,为了克服单个利益集团势单力薄的缺陷,这些集团在追求各种各样帝国主义或军事利益的过程中往往会结成互助联盟,为此不惜执行一种比任何单个集团所希望看到的都更具有扩张性的对外政策。由于这些利益集团自身的利益比较集中,在组织、技能、信息等方面拥有自身的优势,这对其推广各种“帝国迷思”十分有利。而这些迷思经过长期宣传之后变得根深蒂固,以至于产生一种“后坐效应”:或者精英阶层将各种迷思内化,自己也相信了它们的真实性,或者虽然精英们自己不相信,但为了自圆其说,为了稳住已经被动员起来的国内大众,为了保持自己国内统治的稳定,也不得不继续硬着头皮走下去,接受自己因为推销各种帝国迷思而带来的意想不到的严重后果。无论上述哪种情况出现,都使得即便某些头脑清醒的精英分子或集团想收缩力量,也已经变得不可能,结果便造成了国家的过度扩张。

在斯奈德看来,上述情况最容易发生于国家权力被具有明显集中利益的集团所把持的卡特尔化的政治体制当中。而在实行民主制(在这些国家中利益是分散的,并且能够通过选举和问责制来对那些拥有集中利益的利益集团构成制约,同时也没有信息垄断的情况,从而使战略迷思的制造更加困难)或单一寡头制(寡头在避免过度扩张的成本方面拥有统括性利益)的国家中,过度扩张的情形却较少可能发生,即使发生了,其程度也不会那么极端。在独裁体制下,过度扩张的程度是比较难以预测的,因为在这种体制下,对于领导人的偏好不存在什么制度上的约束,他可能是一个狂热的扩张主义者,也可能是一个可以对过度扩张的卡特尔施加控制的理性主义者,国家最终扩张与否取决于独裁者的选择。

斯奈德进一步提出,一个国家的政治体制是民主制、单一寡头制